

臺灣社會學刊，2006年12月
第37期，頁251-260

評 論

被殖民經驗：「去帝國」的情感基礎 評陳光興《去帝國：亞洲作為方法》

2006，台北：行人出版社

李丁讚

李丁讚 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教授 (dtlii@mx.nthu.edu.tw)。

Ding-tzann Lii, Professor, Institute Sociology, Tsing-Hua University.

陳光興的新書——《去帝國：亞洲作為方法》（以下簡稱《去帝國》），是華文世界中，第一本嘗試從第三世界的角度來處理帝國主義的作品。過去，我們雖有很多關於帝國主義的研究，但都是在歐美學術傳統的典範下進行論述，對話的對象也以歐美的理論為主。《去帝國》則是真正地以「亞洲」為中心，進行亞洲內部的相互參照，從而帶出一種以「被殖民者」的角度來思考的視野。難怪 Stuart Hall 會說，《去帝國》是“a substantial work in ‘de-colonising’ the field”，是陳光興嘗試對「帝國主義」這個領域進行「去帝國」的工程。這種從第三世界來觀看帝國主義的視野與旨趣，是《去帝國》的基調，也是它與其他相關研究最不同的地方。

《去帝國》除導論外，共有五章。第一章〈帝國之眼：南進論述的次帝國想像〉指出，台灣 1990 年代初期的「南向政策」是一種「次帝國」的文化想像，是昔日殖民邏輯的投射與延伸，也顯示台灣的「去殖民」的工程尚未完成。這是一篇引子，透過對「南向政策」的討論，細緻而深刻地帶出台灣文化主體性的複雜問題。

第二章〈去殖民〉、第三章〈去冷戰〉、第四章〈去帝國〉則是三篇環環相扣的文章，從理論和經驗現象來闡釋台灣問題的歷史與結構根源。陳光興的主要貢獻有二：1、以「冷戰」來連結日本的「舊殖民主義」與美國的「新帝國主義」，一氣呵成地解釋了台灣帝國主義的發展史，甚具經驗詮釋的原創性。而且，因為「冷戰」的對抗格局，台灣被納入以美國為首的新帝國主義的殖民版圖中，並因此產生了「親美仇中／共」的政治情結，嚴重影響到台灣文化主體的心靈構成。2、「去殖民」不只是本土化或獨立建國，而更是深刻的心靈重建。陳光興根據 Fanon 的精神分析學指出，殖民必然產生心靈暴力與創傷，進而形成一種殖民制約的精神機制，表面上好像在反對殖民，但實際上只是殖民邏

輯的複製與重現而已。這兩項對台灣當前處境的觀察是深刻而值得我們認真思考的。

第五章〈亞洲作為方法〉是《去帝國》最具原創性的一章，也是「去帝國」的實踐方案。陳光興指出，在西方學術帝國主義宰制下，第三世界的學術生產只能發現我們的「無」，如「為什麼我們『沒有』資本主義？」。但是，當我們回到亞洲內部，彼此以對方為參照時，我們所發現的並不是我們的「無」，而是我們的「特殊性」，如我們的工會與韓國有何不同。正是這種特殊性的挖掘，才能建構台灣社會的特殊結構與紋理，而這是過去帝國主義似的生產方式所無法產生的。因此，「以亞洲為方法」不只具有政治實踐之價值，更是一種知識論，對被殖民國家的知識生產，提出重要的批判與反思。

整體來說，《去帝國》是一個帝國主義的文化分析，和以前「文化帝國主義」的分析不同。過去的文化帝國主義研究強調，帝國主義的文化如好萊塢、麥當勞等，如何侵入第三世界，對第三世界民眾「洗腦」，進而讓大家在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中臣服，變成帝國乖順的子民。但是，《去帝國》並沒有順著這條簡易的路子開展，而嘗試問一個更根本的問題——「為什麼第三世界的子民會喜歡帝國主義文化？」為了回答這個問題，陳光興進入台灣具體的歷史脈絡，嘗試從歷史與政治事件的具體接合中找尋答案，因而發現了「冷戰」這個關鍵性因素。從這個角度來看，《去帝國》是對帝國主義的文化分析，這個文化分析提供過去「文化帝國主義」式的研究一種更堅實的歷史與政治基礎，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情感結構。我認為，這是陳光興對「文化研究」這個領域的貢獻——把「文化研究」安置在具體的歷史與政治接合中。

總的說，《去帝國》是一部大格局的作品，從世界史與亞洲史的寬廣角度來檢視台灣當前的處境。不管在理論或實踐層次，都帶給我們嶄

新的視野與想像。但也因為格局過大，《去帝國》對台灣內部歷史的討論顯得薄弱，除了第一章有一些討論外，其餘各章都只是輕輕帶過，對於當前正在發生的新國際局勢，如中國國族主義也沒有分析。因此，《去帝國》所診斷出的情感結構可能不夠精確。「以亞洲作為方法」雖然是一項很有原創性的提法，充滿想像力，但比較像是實踐方案，背後的理論基礎尚嫌不足，這是《去帝國》必須仔細思考的議題。以下僅就這些問題提出討論。

在第三章〈去冷戰：大和解為什麼不／可能？〉中，陳光興透過對《多桑》與《香蕉天堂》兩部電影的文本分析指出，當代台灣是如何在殖民主義與冷戰的兩個交錯結構中，生產出不同的情感結構，造就了衝突矛盾的情緒基礎，而這正是「大和解」之所以不／可能的關鍵所在。在《多桑》的分析中，陳光興認為「本省人」的情緒結構一直深受日本殖民統治的影響，而這是「外省人」所沒有、也無法體會的經驗。相反地，《香蕉天堂》則顯示，「外省人」歷經戰亂的流離顛沛，也是「本省人」所沒有、也無法體會的經驗。因此，由於族群生命歷史的不同，造成本省人與外省人個別生命經驗的歧異，進而造成兩個族群之間的隔閡。陳光興指出，台灣社會的矛盾與對立，是省籍問題，而不是統獨問題。前者比後者來得更隱形、更深層、也更不可說。我們甚至可以說，省籍問題是統獨問題的情緒基礎。因此，如果大和解可能的話，就要面對歷史記憶，重新開啓被冷戰壓抑掉的歷史，看穿省籍問題是如何體現在我們每個人的身體、欲望與記憶中，從而認真地相互看到彼此不同軌跡的悲情歷史，調整原有認知上的差距，這可能才是走向大和解的起點。

陳光興以上對台灣族群問題的診斷，有其深刻處，但亦有其問題在。深刻的地方是，他正確地指出台灣統獨問題的深層，其實有一個更

隱形的「省籍問題」。因此，要解決族群對立與認同分歧，一定要回到歷史的原點，回到情緒結構，認真來面對它，而不是迴避它。這是精彩的分析。但是，對於省籍問題，以及期間蘊含的生命經驗與情緒的診斷，我卻不能贊同。陳光興認為，省籍差異來自於兩個族群生命歷史的不同軌跡所造成，本省人經歷了日本殖民統治，而外省人則經歷冷戰隔離，以及戰亂顛沛。是兩種平行而沒有交集的生命經驗，讓兩者無法相互體諒。在某個程度上，我同意冷戰所造成的「親美仇中／共」格局，讓我們對中國產生隔閡，甚至仇恨。但是，這種仇恨基本上是對「共產黨」，而不是「中國」而發的。其實，在國民黨統治期間，「中國」仍是台灣人的精神祖國，是文化故鄉，當時台灣人（包括所有本省人與外省人）對「中國」並沒有仇視。當然，當時的中國是由共產黨統治，仇共也因此產生對中國政權下的中國人有隔閡，這也是真實的。但是，這應該不是本省人與外省人隔閡的最主要因素。

因此，我認為，「冷戰」可以在一個大的格局中解釋台灣與中國、美國和日本的關係。但是，台灣內部省籍問題的產生，最大的原因並不是冷戰，而是台灣內部的殖民歷史，也就是國民黨遷台後對台灣人進行威權統治，包括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以及各種政治和文化上的歧視、壓迫等。本來，這些壓迫來自國民黨的統治階級，與絕大部分的外省人無關。其實，白色恐怖中，外省人也是被破壞的對象。但是，因為國民黨的統治階級大多來自中國，很自然地就變成是「外省人」的代理人。因此，本省人遭受壓迫後，很自然地也就遷怒到「外省人」身上。這是一種不幸的「誤置」，但卻是省籍隔閡之所以產生的關鍵因素。

除了國民黨的內部殖民之外，中國在當前國際政治對台灣的打壓，也是省籍隔閡的另一項重要因素。本來，中國的鴨霸其實和外省人無關，但不幸的是，在中國對台灣的壓迫過程中，國民黨的態度表現相當

曖昧。連戰訪問中國，與中國簽訂一些已經有準官方性質的條約或協定，讓很多本土意識比較強的本省人對國民黨有「聯中制台」感覺，也再度地把國民黨與外省人連結在一起，大大地深化了之前的省籍情結，進而也激化了統獨意識。這都與「中國」這個外部因素的存在有關。今天，中國正在形成一個新的「帝國」，具有強大的國際政治經濟實力，是整個全球新帝國主義的一環。陳光興只對過去的美國帝國主義進行批判，而沒有看到今日「中國」的崛起，以及這個崛起對亞洲、世界的影響和意義。中國的國族主義、甚至文明主義正在形成，與日本共同構成亞洲兩個強權霸主，但《去帝國》只從規範角度來談「亞洲」，認為亞洲各國要轉向內部，相互參照。當成一種「規範」，「以亞洲作為方法」自有其價值，也為我們帶出更寬廣的視野。但是，從國際政治的角度來看，《去帝國》缺乏「權力」的分析，將是一項缺陷，這個缺陷使得「以亞洲作為方法」顯得不夠周延。

我們前面提過，陳光興根據Fanon的殖民精神分析學指出，被殖民者由於受到殖民統治的深度制約，因此，「去殖民」往往表現出一種對殖民的「反動」，對殖民地固有文化或歷史等，會毫無選擇地肯定、歌頌，進而表現出一種很「內縮」的本土化或國族主義。從台灣過去20餘年來的「去殖民」表現來看，陳光興這些掛慮顯然有相當程度的真實。台灣本土化運動或國族主義的建構，的確充滿對「中國」的排斥與敵意，甚至深化內部的省籍情結，擴大統獨的對立與緊張等。這種封閉性、內縮性、排他性的本土化或國族建構，其實只是過去殖民的制約與反動，並沒有產生真正的「去殖民」作用。因此，為了解這種殖民制約與反動，我們必須回到歷史的殖民問題。但是，這裡的殖民問題，並不只是美國新帝國主義或日本帝國主義的問題，而更應該包括過去國民黨的內部殖民，以及今日的中國國族/帝國主義的問題。無法妥當適切地

解決這些問題，台灣各種「被殖民」的精神壓抑將永遠存在，「去殖民」的各種努力也將永遠無法展開。

「被殖民」經驗的意義是什麼？「去殖民」又如何可能呢？其實，人類在殖民主義之前就一直有「種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縱使是偏遠地區的小部落，也都會認為「自我」比「他者」優秀，而殖民主義只不過是把這種心態用更暴力更全面的方式呈現罷了。但弔詭的是，正是因為殖民主義的作用，世界上絕大多數原來自以為是「中心」的社會，突然間變成了「他者」或「奴隸」。在帝國的權力凝視下，這些被殖民者必須學會放下「自我」，學會謙卑，而用更細膩、更敏感地去對待過去的「他者」，也就是今日的「主人」。也在這個諷刺的意義下，殖民主義帶給歐美核心國家除外的大部分地區人類一個集體學習的機會。¹我認為，只要經過適當的「轉化」，這種對待異文化的新經驗，可以幫助我們學會以更平等、民主的態度來對待他者，建立或促成對異文化的尊重和包容，進而創造出一個與西方宰制性的霸權文化，或是與人類自古以來就有的「我族中心主義」完全不一樣的文化類型。因此，經過殖民主義的集體創傷與轉化，人類有可能第一次學會真正的「蛻讓」，並能夠與「他者」進行平等的溝通與互動，一個真正進步性的社會才因此

¹ 請參考李丁讚，1996，〈「邊緣帝國」：香港、好萊塢和（殖民）日本三第電影對台灣擴張之比較研究〉，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1: 141-70；以及李丁讚，1997，〈邊緣，蛻讓與解放：再談「被殖民經驗」，兼答魏均先生〉，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6: 209-23。這個研究指出，香港的電影表現出一種特別的連結模式，稱之為「蛻讓」。簡單地說，「自我」並不是高高在上，而是以平等的姿態與「他者」對話，進入「他者」之中，與好萊塢的「併吞」模式不同。而香港之所以有這種特殊的連結模式，主要是因為她是一個殖民地，長年的「被殖民經驗」使她能夠以「奴隸」的角度來對待他者，甚至以他者為尊。這是西方霸權所無法培養出來的心態。

成爲可能。當然，這是殖民主義的非預期效果。

因此，如何治療過去殖民歷史的傷痕，走出精神制約的反動，並進一步以此爲基礎，將原來傷痕或苦難的「被殖民經驗」轉化成積極、開放、主動的力量，²進而才能與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各國進行具有主體性的相互參照，並面對美國與歐洲。這種新文化主體的創造，是台灣去殖民的必要，也是（開放性）國族建構的核心工程，更是「以亞洲作爲方法」必備的情感基礎。

台灣，是一個經歷多重殖民的社會。日本殖民主義、美國新帝國主義、國民黨的內部殖民等，各種霸權不斷地凝視這塊土地上的子民，也在這些人民身上烙下深邃的歷史傷痕與記憶。當這些傷痕和記憶沒有經過適當的處理與轉化，它總會以一種受壓抑者的姿態回返（the return of the repressed），甚至以暴力、不理性的方式不斷地重現，而變成一種對昔日殖民的反動與制約。過去20年來台灣本土化運動的內縮、封閉與敵視，基本上就是這種傷痕的體現。因此，要去除這些看似不理性的反動與制約，我們必須進入歷史的傷痕之中，去療癒、撫慰，而不是忘記，更不是壓抑。傷口可以撫平，但不能忘卻。這裡需要的是一種宗教似的救贖（redemption），是一種深度的溝通、理解與同情，而不是簡單的道歉與賠償。但是，更重要的是，這個救贖儀式需要有一個「進步」的面向。我們要把過去「被殖民經驗」轉化成一種積極的力量，透過各種文化的創造，³重新詮釋過去的傷痕與記憶，賦給這些悲情新的意義，讓

² 錢永祥在私下通信中向我表示，大和解應該要有一個「進步」的面向，於是啓發我對「被殖民經驗」的再思考，才把之前對香港電影的研究融進對台灣族群和解的論述中。謹在此向錢永祥致謝。

³ 請參考陳芳明，2006，〈進步的本土主義〉，於10月22日發表於「公民社會與台灣民主」，「七一五」主辦，台大法學院國際會議廳。作者在文中雖然沒有提到「被

受害者能夠因此超越悲情，並進而能以積極、正面的態度來面對「他者」。因為，藉著對被壓迫的經驗的深度體驗，我們更有能力能認識到壓迫的本質，也更能避免壓迫的再生，一個更民主、平等的社會關係才可望奠立，這是積極的「蛻讓」。殖民，是我們的資產，而不是負債。

當我們用一種積極的、進步的角度來重新詮釋「被殖民經驗」時，「本省人」不只可以走出歷史的傷痕，而且還可以進一步地幫助「外省人」面對未來的不安，以及客家、原住民、新住民等各種少數族群的焦慮。而且，因為大家都有不同的被殖民經驗，就更能夠用平等、寬容、扶持的心來幫助社會上的各種邊緣與弱勢，台灣也就能夠成爲一個民主、進步的社會。這是只有歷經各種殖民傷痕的社會才有的資產。我們要善用這種資產。尤其重要的是，當過去被殖民經驗已經轉化成積極進步的力量時，我們才能夠真正以開放、多元的態度來面對全球，尤其是過去的殖民帝國。對於中國/大陸，我們固然要超越冷戰的「親美仇中」格局，但只要中國國族主義尚在，只要中國在國際社會中仍然對台灣敵視，我們仍然必須保有主體性的思維，更靈活地與美國、中國、日本維持良好、平衡的關係。但我們絕不能封閉、退縮、更不要敵視。中國/大陸如果不是父親，至少是老大哥。我們要把「被殖民的經驗」轉化，變成積極、進步、開放的力量，與中國維持平等、民主、積極「蛻讓」的關係，「以亞洲爲方法」，讓中國成爲台灣的資源，而不是負債。

「亞洲作爲方法」是《去帝國》的實踐方案。在這個實踐方案中，陳光興呼籲亞洲各國去除過去對帝國的依賴，面向亞洲，彼此以對方爲中介和想像的對象，「去帝國」才能真正獲得實踐。這是一個很具體的

殖民經驗的轉化」，但很明白地指出，文學要告別歷史悲情，從事更多元、進步的創造。

實踐方案，提供大家很好的想像視野與行動方向。但是，這個實踐方案的行動與情感基礎在哪裡呢？在帝國主義的權力凝視下，包括學術在內的各種生產活動與權力關係，仍然高度受到權力邏輯所網綁，我們如何讓亞洲各國的行動者展現施為與主體的能量，避開帝國的權力之眼，進而轉向內部，相互參照，顯然需要建立一種亞洲共同的文化基碼，進而提供行動者所需的情感基礎。我認為，亞洲各國除日本可能例外，都曾經是帝國或殖民主義的受害者。在「被殖民經驗」的洗禮下，亞洲各國因此有了共同的情感結構，大家因此更能積極地「蛻讓」，進入對方，與對方產生親密的溝通與互動，進而產生共同的文化基碼。這除了讓每個社會的文化主體不斷成長茁壯外，「亞洲」也可以因此而變成一個具有真實內涵的想像的共同體，並進一步與歐美產生積極的「蛻讓」，這時，歐美帝國也就不敢再以「他者」來看待亞洲，真正的「去帝國」才能誕生。從這個角度來看，「被殖民經驗」是「亞洲作為方法」的情感與行動基礎，也是「去帝國」得以實踐的關鍵元素。

作者簡介

李丁讚，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教授。研究興趣為：公民社會與民主政治；現代社會與物質文明。